

学林漫笔

十二集



学 林 漫 录

十 二 集

中 华 书 局

封面题签 王蘧常
封面设计 谈冰玉
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

学林漫录
No. 1810-1

学林漫录

十二集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7 7/8印张·134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

印数 2501—5500册 定价：11.00元

ISBN 7-101-00266-8/Z·29

目 录

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	程金造 (1)
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	
——缅怀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	张建业 (18)
我所难以忘怀的人	
——王季思教授	[日] 波多野太郎 (28)
诗坛话旧	仲 翔 (31)
黄宗羲与《明文海》	谢国桢遗稿 (46)
坚净居随笔	启 功 (57)
《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》之曲文、	
绘画与书法	蒋星煜 (60)
古敦煌民间游戏	高国藩 (70)
郑板桥诗三题	卞孝萱 (79)
读书随笔(五则)	曹道衡 (83)
韵语雌黄	傅天翔 (87)
漫谈“捐班”和“候补”	周采来 (93)
龚自珍的说“书”诗	王英志 (96)
小说勾陈	齐如山遗稿 (102)
张评本《金瓶梅》琐考	
——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之五	吴 敢 (119)

李卓吾评点《水浒传》与冯梦龙	李剑雄 (130)
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	李时人 (137)
韩愈的“阳山之贬”析	阎 琦 (145)
杜牧生平事迹考辨	吴在庆 (157)
《启祯集》与“黄培诗案”	卢兴基 (165)
明版《山堂肆考》跋	张重威遗稿 (176)
梁讷及其《承晋斋积闻录》版本考	沈培方 (179)
周篆和他的《杜工部诗集集解》	王学太 (183)
方志体裁漫谈	陈光贻 (192)
小斋书记	周绍良 (198)
来燕榭书跋	黄 裳 (209)
苏继庠先生遗翰	
——访书所见录	肖新祺辑录 (222)
探幽发蕴议论纵横	
——宁宗一同志《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》序	
.....	刘叶秋 (235)
重修破山寺碑记	钱仲联 (242)

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

程金造

我以为，写文章应当是“写此事必深知此事，书其人必深识其人”才行。我对先师高步瀛（阆仙，谥贞文先生），从学既晚，知受无多，只听人说先生门墙甚高，我企而望之，犹不能见其帷席，哪能写出先生的文章学问真实的情况呢！当日本军侵据北平时，我常见先师的旧教育部同事冯承钧（子衡）先生，探问法文报所载的抗日战争情况。冯先生尝言及先师说：“阆仙先生学问渊博，所以谈笑是很有风趣的。”可是当我得以常见贞文先生，说话无所拘束之时，是在日本侵华，北平沦陷，国家累失重镇，军队节节败退之际。每次见先生，他总是忧心愁苦，面无喜色；有时谈到战争事件，竟至痛心疾首，失其常态。往时言谈中的风趣，却全然不见了。所以，要写出先生独有的谈笑韵味，我也是难以下笔的。前几年《晋阳学刊》编辑要我写了一篇《高贞文先生传略及后记》，刊登在八三年七月版的四期。这《传略》，原是多年前所作《行述》一文的改名，《后记》是后来补入的。其文刊误太多，脱略更甚。现在，我写《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》，首先应补入《晋阳学刊》一文的：先生生时是夏历十月三日。应更正的是：其迁社会教育司司长，是在民国元年，由教育部编审处主任迁升的，而不是四年。先生长社会教育司，凡十六年，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社会教育司长。此事见于先生为其母作的《高母张太夫人行述》文中。又，先生逝世后，其灵柩是在宣武门外广惠寺权殡，而不是法源寺。后两事是我偶检四十年前的日

记查出的。今天更正《晋阳学刊》一文中的这两点错误及一点遗漏。

现在无须重复《晋阳学刊》一文所述之事，仅就我回忆先生知友、学生所言，和我所闻所见的先生身前后之事，以及检书发现的先生作的几篇文章，谈谈先生精湛渊博的学问，爱国正义的精神，和教学启发与提携后进诸事，作为《晋阳学刊》载录的又一次增补。

一、先生精湛渊博的学问

先生的学问文章，至今回忆，仍无以测其精深渊博到何等程度。因为先生著述多至二三十种，我不曾全读，就是曾读过其少量的几种，也并不精通其义。所以要写出先生文章学问的具体情况，是我难作到的。但是，先生的渊博能文，社会上早有评价。先生的知友齐宗颐（寿山）先生，是我乡前辈。寿山的尊君齐令辰老先生，是清季省中的名进士，与当时学者多有往还。他曾对寿山说：“你别看高闾仙年岁小，这些常来的进士翰林，都不如他。高闾仙根柢坚实，渊博精通，人又极聪明正直，是不可限量的。”贞文先生，长于寿山八九岁，推其年，当是在先生三十左右时，齐老先生说的这话。先生在壮年声望已是如此。寿山先生以后到德国学经济学，但其家学渊源，经史之学，非常深厚。他和贞文先生是知交，又同在北洋政府旧教育部共事多年。寿山曾对我说：“闾仙的渊博，可举一件事说明。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号一代书簏，还有不知缺疑之处。闾仙作《李注义疏》，却都把李崇贤缺而不知者注出，你就可想见了。”但是这仍不能具体说明。先生有《跋王西庄窥园图记》一文，原稿给了我，今抄出由先生自己去说明一部分。《跋》文是：

沈兼士先生，出《窥园图记》属书其后，记为王西庄先生为费玉衡作，江艮庭书。后有章太炎及陈（援庵）、黄（晦闻）、余

(季豫)、杨(遇夫)诸先生跋，琳琅满目，诚瑰宝也。粤自有清中叶，汉学大昌。研今文者，上溯江都；究古谊者，同尊高密。故玉衡作绘，小示异同；西庄论学，特明崇仰。夫董子专心讲诵，不观舍园，史迁所称，班掾所述，极言勤学，无与治生。是以论古索偶，拟人必伦。朱新仲能举其三，王伯厚更广为五。仲壬张弛之喻，理合通方；邹子园圃之文，例同挾字。（自注：《论语》“禹稷躬稼而有天下”，李斯书歌呼乌乌快耳目者，其“稷”字、“目”字皆文家所谓挾字。邹子言仲舒三年不窥园圃，《艺文类聚·兽部上》引无“圃”字。《太平御览·兽部九》引有之。类书虽有删节，然必求不失本旨。圃为挾字，故删之无害，不必泥树果蓏之训说之。）桓君山推言六十，俗说更甚于《儒增》；李弘范分注董仪，属词稍乖夫比事。（自注：《法言·修身篇》云：“公仪子董仲舒之劬也。”李注当引《汉书》“董仲舒终身不治生业”之语。其引三年不窥园事，颇与公仪事不相类。）章、黄别有会心，陈、杨实持正谊，取为定论，无俟讼言。窃尝辑胶西之集，绎《繁露》之篇，以为山川可讼，诂废游观？瓜果可供，宁无采摘？（自注：《春秋繁露·四祭篇》曰：“地之菜茹瓜果，艺之稻麦黍稷，菜生谷熟，永思吉日，供具祭物。”）盖古人述事，每取形容，后儒读书，时牵文义。若执不窥之说，且限三岁之期，是则孙生映雪，晴昼无挾策之时；郑灼抢瓜，隆冬乏镇心之物。乃叹应天因时之道，（自注：应天因时四字见《繁露·五行相生篇》）何莫非藏修息游之心。虽谓玉衡此图，即为董子下一转语可也。而西庄之言，亦有可商榷者。不辞浅陋，试覼缕之：宣尼学《易》，寡过是期；辅嗣注经，玄言独擅。清儒削其野文，济以古义是也。特是枕膝之诬，梁丘既疏而明证；菱兹之训，赵宾亦始取终违。惠氏《易述》，乃目为单词，诋为谰语，谓孟坚之失实，许慈明为知言。宁非颠倒是非，强腾口说？观

其伐材鼎祚，探源仲翔，而巽鲋在井，杂取子夏之书。（自注：井九二，井谷射鲋。惠注云，巽为鲋，虞义也。又云，鲋蝦蟇。则取子夏易传，与虞谓鲋小鲜也不合。一字取二家之义，又各不同他家，解经所罕见。）兑虎非坤，反从俗儒之说。（履虎尾，虞注以坤为虎，谓俗儒谓兑为虎。惠氏以虞为非，而颐六四虎视眈眈，又注云坤为虎。）天厨酒食，不取郑氏之爻辰；世卦游归，略见京房之飞伏。若铸九州之铁，实同百衲之琴，止宜称为专门，未可绳以家法也。费君师说，未得览观，三家残丛，尚堪采辑。而叔重说解，略存古文；德明音义，多属异字。欲求章句，已惜单微。他若费记天文，尚存分野。孟推卦气，爻起中孚。甚至天降小雨，封事能详；地发大云，杂占可验。京氏末流，夷于术数。是为阴阳之别派，殊非《易》学之正宗。此可为商榷者一也。永嘉遭燹，晚出梅书；贞观修文，谬宗孔传。清儒标廿九篇之斗极，证十六字于道书。东晋伪昭，南山狱定。是时集注既出，后案亦成。岌岌两峰，照灼千古。乃者传参仲默，江则讳而不宣；（自注：江书与蔡传，间者数十则，而不肯引蔡传。《东塾读书记》卷二摘出。）说异康成，王辄诋为非是。何异伯尊入告，攘辇者之善言？列兰说经，毁仲舒而立死？且西庄既高树汉帜，专精郑书，何以《酒诰》称王，不补晋人之削字？彭蠡作汇，莫辨徐坚之驳文？（王书误引《初学记》郑孔注释禹贡三江既入，实非郑注也。研经室一集浙江图考辨之甚确）。此可商榷者二也。郑君囊括群经，洞达《三礼》，尝注《左氏》，旋授服生。北人视目，犹行子慎之书，南学捃华，先重成侯之学。孔疏既出，贾义并微。以彼钱癖等夷，金行佐命，恒假《春秋》褒贬之义，隐饰典午篡弑之奸。是以刘炫《规过》，特下针砭；焦循作论，尤严铁钺。至若土地之考核，历数之推寻，比于前修，实为特出。试以新旧参观，亦复得失互见。叔段犯上，谁谥嘉

名？邓侯求援，宁盟本国？虞思为幕，胡居瞽瞍之先？夷昧生光，乃袭《公羊》之误。凡兹覆辙，自贵改弦。而士佾二八，竟易四人；楚偏五十，乃云一乘！褰衣金玦，昧方相为狂夫；琼弁玉缨，违马饰之旧制。徒标异说，反蹈岐涂。又若晋从五人，贾佗实为季子；（自注：《左·僖廿三年》：晋公子从者五人，有司空季子。杜沿服注以为胥臣。而郑詹所言晋公子有三士，则以晋语狐偃、赵衰、贾佗三人证之。昭十三年叔向言先君文公有士五人，下文历举四人有贾佗。特以颠颐罪诛，故不复数耳。知五人中之司空季子为贾佗明矣。此外佐证尚多，余别有考，文繁故不录。）舜流四罪，共工诘是穷奇？（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舜流四凶在宾门之时，而四罪在摄政之后。贾服注《左传》文十八年误合为一，郑注《尚书》因之，杜因之。）奈何滥侧胥臣，谰诬史克？遂致郑詹、叔向之语，皆不可通，宾门摄政之年，更无由别。斯又徒为沿袭，未知纠绳者矣！抑更有疑者，西庄既言尊郑，又云扶服，而三月成昏，竟异《礼经》之注；五侯作牧，显乖《郑志》之文。矛盾既行，左右奚袒？此则可为商榷三也。若夫侈张絳纬，实竹垞之绪余，轻訾前人，致晓征之讽谏。余君跋语，先获我心。至从长弃短，转益多师，薪火可传，江河不磨。则西庄先生，固吾辈所愿执丹漆以相从，奉馨香而辰拜者也。嗟乎！钱精王博，代复几人？蔡绢江毫，艺兼二绝。先民不作，空披《蛾术》之编；痼疾难瘳，竟绝燕游之乐。（自注：时余卧病期年不能出门。）勉策跛鳖，聊成续貂，尚冀兼士先生，悯其愚而匡其谬也。

王鸣盛（西庄），清代号极渊博，而先生此文，结合诸家经注，把王氏的经学作了个总结，加以论断。如果不是渊博精深的学者，谁能看到这些？而且，文体是四六。四六多用成语、成句和定型的词组相对。读书不博，记忆单寡的人，是作不出来的。文中在史事方面，

用史事申说，经学问题，用经学论辨，更不是一般学者能作到的。此文，是词省而意多，用事是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抑扬往复，情意浓郁，使人读之，饶有韵味。而其格调雅正，真是大家文字。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二十多年，所教过的课，总其前后，有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、杜诗、骈文、辞赋、唐宋诗、历代散文、经史子集文诸科，都属文章性的。其讲义，都有注解。而其注解又都用经书注疏体裁，可称作不刊之作。当前还无有流行本（《唐宋文、诗举要》已印出），不能说不是学术上的一个损失。

我在一九二七年上师范大学文预科，常去听中文系（国文系本科）的课。那时系中请来黄节（晦闻）先生讲《毛诗》。同学们震于黄先生是当代无偶的大诗学家，多去听讲，我也随人进入教室。黄先生年事已高，满口广东话，我只听清他念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”这句，其他一概听不清。下课后有同学陪同黄先生走，谈到高先生，黄先生态度庄重地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考据家，主古文。”其实贞文先生于经说也不完全主张古文。试看他笺证的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，其中凡涉及经学今文古文的，先生都是从经书起，尽引汉魏六朝唐宋及清代今古文家说。派分系析，择是而从。或是申剖订定，书出己见，并不墨守一家。先生著的《古礼制研究》，其中释“明堂”、“学校”、“祭天”诸制度，和说《三礼》源流，都是在一问题之下，援引历代今古文师说以及子史集部书籍，旁参博证，著其旨归于一是。而且其论断，语多精妙，不费笔墨。如一九三四年《师范大学月刊》所载先生《段懋堂顾千里论学制书平议》（《月刊》“平”字误作“评”）一文，首先说明段、顾二人起辩之由，然后分两段论述，一是《王制》西郊是否应作四郊，二是《祭义》中郑注“四学”谓周四郊之虞庠是否当作西郊。此先从《王制》注涉及《祭义》注、疏问题，明段、顾二人之得失。以下又解决牵连的五个关切问题，详细剖判，最后论断说：

观右所陈，其一、二、四、五段，段氏皆失之。其三段则顾氏失之。顾氏墨守孔疏，故发明少而所失亦少。段氏多反孔疏，故创造多而所失亦多。此五段之事皆牵连所及者。若其辨讼之大端，则段皆得而顾皆失。《王制》注可改西为四，而《祭义》之注，不能改四为西也。

段玉裁是清中叶的大经师，晚年居苏州，为一时学者所宗仰，称为大儒。而其与顾广圻讼辩多年所不决者，先生结合《三礼》各篇疏注，断其是非。其为学之渊博如此。

这些古事考据，现在一般人看来，或以为无有必要，其实不然。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路程、一阶段前进来的，单凭地下发掘，遥揣上古三代情况，不但无法预期，系统起来究竟也是困难。要建设共产主义的制度，总结上世的经验，这种考证文字，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。

先生的考证，有个特点，就是一守前人“无征不信、实事求是”的态度，绝不出于武断。所以往往考核一问题，凭其渊博的知识，引尽各家说法，到当下论断时，先生总不肯下，使读者自己去会悟，如此则能启发读者之思考。现在出版的《唐宋诗、文举要笺证》两书，就有多处可以看出《唐宋文举要》标点本句读有误。

二、先生的教学和对我的启导

先生教学、讲诗文，并不擅辞令，又操的河北话，在不习惯的南方同学听来，有如北方人听黄晦闻先生讲《毛诗》，都是很费力的。可是，比我早五年的老学长吴文金曾说：“高先生当初开了一门《古文辞类纂》课，是本科二年级的必修科，每周四小时。先生讲的透彻精辟，学生受益多，很感兴趣，于是其他年级和史、地、外文诸系的同学，也纷纷来听，一时教室有人满之患了。

我入文预科时，到国文本科听课，先生讲韩文，总说韩文比八

家中其他家好，直是上追迁、固。但那时我却不以为然。我认为八家中韩文最差，句子别扭，用字生疏，好在何处，真不理解。先生一次又说：“韩文是学《尚书》的。韩文中碑铭为好，碑铭中《平淮西碑》、《曹成王碑》诸篇，是韩用力之作。”我深记此语。后来，讲《平淮西碑》了，我坐在靠前边。先生先朗读了一节：

天——以唐——克肖其德——圣子——神孙——继
继——承承——于千万年——敬戒——不急。

用一种抑扬顿挫，长短不齐的音节，把文中含意，已全然表现出来了。我从此才悟识出韩文造句用字的简核。韩不说大皇帝之有土有民，享有天地间的一切，是受命于天，不是受命于人，而是用“天以唐克肖其德”，七字为句，就完全道出此意，意切而字音浏亮。我从此承认了韩文之高，真是六经的旨归，史迁的格调，韩文确是学《尚书》而加以变化的。

当我到本科三年级时，先生守制。所任的课，请了他教过的学生、当时燕京大学教授董先生代授。董先生聪明渊博，又是满人，口才极好，很受同学欢迎。我和范凯之、马近仁、牛文青等同听董先生讲唐诗。一月多以后。我们几人在宿舍闲谈。近仁说：“董先生很能说，也很能发挥，但是和高先生味道不一样，高先生并不能说，可味道浓厚，董先生有些不同，这是何道理呢？”我们一听近仁此言，颇有同感，而一时又不明其故。最终，范凯之说：“我看还是理解问题。诗文都有其紧要之处，高先生在此关键处，是把文外之致揭出，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两句，却使人能领悟。董先生很能发挥，但多在人可理解之处，这就是其不同点。”凯之此言，使我们都有所领悟。先生选教材，多取有关历史的大事件，如汉文《论六家要旨》、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、《谏不朝单于疏》，唐宋文中之魏征《上疏》、刘蕡之《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》、王安石之《上仁宗皇帝书》。苏轼之《上皇帝书》等等。这在学术上，历史上都是极重要的事，关

及国家盛衰问题。选此，以使学生对中國重大事件，有个具体认识。先生讲书的特点，一是全如其人，外表中和无奇，而其聪明超逸，即在其中。所以听先生讲课，要得法，不得其法，是不易感兴趣的。其法是：未讲课之前，先把讲义注解、考证等细心看两遍，心中有个认识。然后再听先生讲，如此才能体会出先生的真知灼见。再一个是，先生上课极少请假，而且按时上下课，从来不迟到早退。这在当时教授中是少见的。

我毕业后，教书在北平，所以能常到先生家看看，或问书中问题。记得先生已是从小沙果胡同迁住到西京畿道了。那时，冀东虽乱，北平尚未沦陷。先生旧友涿县杨汉云，在先生家校《刘申叔集》，他是个博通经籍的清季举人，和我也就熟识了。一次，我去看先生，杨老见我来了就放下书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喜好《文选》和《史记》，《史记》你当然有心得了。”我急忙说：“杨先生，我不行，我无心得。”杨老又说：“你读的遍数不少吧？”我说：“论遍数不能说少，可越读越不懂。”先生听我此言，近前就问我：“怎么遍数不少还不懂？”这使我只有照实情说了：“我开始读《史记》，觉其文从字顺，比经书好懂的多，自以为懂《史记》了，有了兴趣。后来再读，发现从前认为懂了的，却是错了，于是继续多看，又发现许多处不能懂，虽然也解决了一些不懂之处，终究还是不懂的太多。经书的不懂，在于名物制度和佶屈聱牙之处，一看就发现了。《史记》之不懂，多是在文从字顺之中，我的功夫还不够。”杨老又问我：“由博反约，这话你懂吗？”我说：“懂一点。”于是老师问我：“约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约是少，大概有精的意思。一书多是联系到许多书，从群书去结合联系之处，才能对此书真了解。”老师说：“还对。”

先生从西京畿道迁住按院胡同十八号时，杨老还是在先生家校《刘申叔集》。一天我去看老师，杨老同我寒暄，问：“《左传》熟吗？”我回答：“不熟、不懂。”这本是我无心之言，可是杨老却追问起

来：“你什么不懂？”我闻此言，深悔无考虑就随意答话，不得不找问题说了，就回答：“传不传《春秋》，我就不懂。”杨老问：“你说传不传？”我回答：“有的说传，又有说不传，我就不知何从了。”于是杨老又追问：“谁说传，谁说不传？”我说：“二刘呗！”“哪个二刘？”杨又问。我说：“刘歆、刘逢禄。”杨老笑了。而这时先生走过来问我：“太史公称《左传》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太史公称《左传》叫《国语》，叫《左氏春秋》。”先生马上反问我：“为什么不叫《左传》？”我说：“太史公从董仲舒学《公羊》，当然他不承认《左传》是传《春秋》了。”

先生问我：“《公羊》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不是讲《春秋》大义的吗？”先生又问我：“《左传》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《左传》也讲《春秋》大义。”于是先生说：“他怎样讲的《春秋》大义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什么书曰云云，或是以书也云云，这不是讲《春秋》大义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好，《左传》能背吗？”我心慌了，说“不行，不能背。”先生说：“当然不能全背过。你先背诵一下郑伯克段吧！”这时我只好背诵起来，背到“五月辛丑，太叔出奔共”，先生用手示意说：“停，——再接着背。”我又背：“书曰郑伯克段于鄢；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，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”先生又用手示意说：“停，——以下再背。”我又背：“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……”先生说：“好了，你看，‘遂置姜氏于城颍’，这遂字是承接哪一句来的？”我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承上句‘大叔出奔共’来的吧？”先生于是启发我说：“你看，这‘书曰郑伯克段于鄢，段不弟故不言弟’以下数句，是否是后人加入的呢？”这时，我又想了想说：“是，很像是。”先生于是说：“那么太史公不称它是《左传》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杨老在一旁也笑了。

先生迁按院胡同，已临西城墙根了。是在日军侵据北平之前迁去的。北平既已沦陷，伪师范大学成立，致函先生上课，先生引为大辱，复一信，斥绝之。而此时总感头痛，遂从此不再出门。^①在

当时，居住北平的人，如果不是汉奸，多是相互走访，探闻抗战情况。先生既不出门，而江陵曾广源（浩然）与杨汉云两先生，总常去看先生，谈战争传说情况。我也常去打听战事消息。有一天下午，私立辅仁大学沈兼士先生来老师家，我一进屋，沈先生就要走了，走时对老师说：“可多几句废话，寿幅长，临时可删去。”我知道沈先生是请老师撰《陈援庵先生六十寿叙》的，就对曾先生说：“沈先生这大文字学家，对文章还不太内行。”老师送沈出屋回来，听我说这话，问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时我害怕要受先生申斥了，背后论人，是不应当的，深悔失言之过。先生见我迟迟不敢回答，就一再催我，态度却始终是正常的。因而我就大胆地发为狂言了：“一篇文章，从主旨发出，宾主、前后，是多是少，是有一定方法的，哪能有废话？”于是先生问我：“什么是文章的一定方法？”我说：“一篇文，有主有宾，有开有合，有呼应，就是一定的方法。”先生又问：“什么又是不定的方法呢？”我回答：“宾主怎么安排，何处开，何处合，这些就无一定。”先生闻我此言，进一步启发我说：“怎样学这些方法呢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从文章里学了。”先生说：“文章以外就无法学了？”我说：“学文章，不从文章学，又从哪学？”于是先生指挂的一张画说：“你看上边有文章没有？”我端详了一会说：“啊！有宾主。”先生说：“最鲜明的文章，是皮簧，皮簧里可真有好文章。其实，天地间无处无文章，李白不是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吗？”当时，我理解先生这话是指经史子集所著录的，尽是天地间之事物，所以天地间尽有文章材料和方法。现在回想先生所以能有这些透彻的见解，广大的识悟，主要在于他幼年已熟读九经，又每日清晨一醒就背书，从经史子集次第背诵，到早饭时为止，直至老年，未尝间断。书只有多背诵，才能精熟，也止有精熟，才能运用。先生是深得其道的。

三、先生的爱国正义精神

先生既以考据文章名当代，曾为一时的军政要人折服。北洋政府皖系势力方张之际，徐树铮号文武全才，仰慕先生是北方大儒、文章巨擘，常求先生批改所作的文字，总是称老师作“先生”，不带姓名，其意愿以弟子自居。可是先生淡泊自守，对徐不亢不卑，从未向他有过请托。此事是先生在清季教过的弟子涿县王燮虞对我说的，^②还不是我所亲知。我所亲知的，是我的一位乡前辈（不同邑）王先生，曾托我转求老师为其父作一墓表，我无法拒绝，但又不明其意。因为王某与老师是多年有往还的旧友，又是旧教育部同事，却要我为他转求。于是我问老师的外甥（妹之子）朱仲思，仲思说：“王某某碰了大钉子，不好意思去了。”我追问仲思：“碰了什么钉子？”仲思说：“王某某拿了一袋五万元的钞票，求你老师给陈调元的父亲作篇墓碑，你老师坚决拒绝了，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了。”及后，我又问过齐寿山先生，寿山说：“某某（王某的字）就是为此事把事情丢了（王为陈秘书长）。他不真正认识高闾仙。周豫才（鲁迅）就比他眼准。我几次到上海见豫才，有一次豫才说：“闾仙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，闾仙高就高在这。”然而和贞文先生有往还的人，求为其亲戚故旧作篇碑碣墓表，先生在情面不可开绝之时，一定先从旁探知所写人的品性善恶实况，然后实允。^③而且，凡给人作文章，绝不受苞苴赠送。^④先生在清季教过的学生张绶青，^⑤和我在女师院同过事，曾说：“高先生作官多年，辞章擅一代，可从来未受过一份馈送，更没有给别人送过礼。”先生是个清静自守的人，又很乐成人之美，济人之急。他在师范大学任教时，见到一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科目零杂，多是因人而设课。先生认为，各年级修习之科，先学后学，应有个前后上下的内在联系及次序。主其事者应当通悉目录学。那时，同学王重民擅长目录，卓有成绩，所以一毕